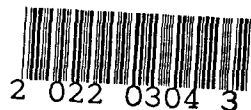


傅衣凌 著

明代江南市民經濟試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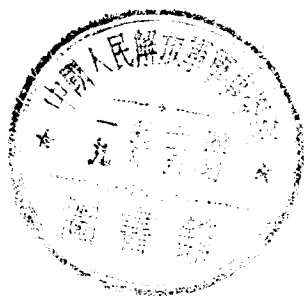
上海人民出版社

121919



明代江南市民經濟試探

傅衣凌 著

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1957年·上海

60003/20
05

明代江南市民經濟試探

傅衣凌 著

*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上海 錦興路 54 号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 001 号

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

*

开本 787×1092 公厘 1/32 印張 4 1/4 字數 92,000

1957年9月第1版

1957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數 1—4,000

統一書号：11074·118

定 价：(9) 0.46 元

封面設計：余竹君

封面題字：范一辛

目 次

一	导言	1
二	明代江南富戶經濟的分析	24
三	明代江南地主經濟新发展的初步研究	57
四	明代江南的紡織工业与織工暴动	78
五	明代后期江南城鎮下层士民的反封建运动	101
六	附录：論明清时代的棉布字号	127
七	后記	131

一 导 言

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論及資本主义生产萌芽时，曾說：

資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，在十四世紀十五世紀，已經稀疏地可以在地中海沿岸的若干城市看到，但資本主义时期是从十六世紀开始。[1]

按照馬克思的話，資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系孕育于封建社会的胎內，而稀疏地表現于經濟較為发达，交通較為便利的地区。那末，关于中国資本主义生产萌芽的开始时期及其出現地区，是怎样的呢？对于这一个問題，最近几年来国内外学者曾引起了热烈的討論。据我們底意見，則認為中国資本主义生产萌芽的开始时期，当以明代嘉靖(1522—1566)前后，也就是十六世紀为一轉折点，而首先在江南及沿海地区表現出来。本書即就这一时期的江南市民經濟的发展实質，試作初步的探索。

这里，有一个問題，就是，为什么嘉靖以后，江南經濟会有这样迅速的成長呢？这不是偶然的現象，而是有一定的历史条件为依据的。早在嘉靖以前，中国各地的社会經濟即逐漸萌生新的变化，無論在江南或其他地区，都或多或少的出現一些剛露出地面的新东西，浙江的太平县志就有这样的报道。

明初地曠人稀，土田不过亩一金，是时法尙严密，縉紳士庶罔敢侈肆，衣不过細布土縑，仕非达官不得輒用紵絲，女子非受封不得長衫束帶，居室无厅事，高广惟式。至

宣德正統法網漸疏，奢侈竞起。成化宏治間役輕費省，生理滋殖，田或亩十金，屋有厅事，正德以来，貧耗而无高資，鮮所借貸，民由是困。〔2〕

其在湖北的京山，也是如此。

李大泌尝言成化弘治以前，县之俗椎魯少机械，有小忿輒能遣恕，不相質論，其讀書为士者，虽被儒服彬彬，齿于縉紳学士之列矣，亦長厚，食不重味，衣无綺紈之飾，宴会招宾客，幅紙單報，轉相傳視，至則罗短案，妻子出拜，刺刺笑語，不以为嫌。長老有事，后生小子为之执役，若子弟童奴，其忠厚少文如此。自后声名漸辟，文物轉盛，生齿繁多，机心蠅起，强弱之势一分，侵蝕之計从出，甚或巧文舞断，愚氓斂手，故令当道言俗美下移者，頗以京山为口实，盖在壬午癸未（1522—23）之間，县之风俗实一变矣。自后密邇郡邑，車馬繁会，五方奇巧之选，递相慕尚，加之商賈負販，坐食富厚，百工技艺，杂然并集，盖在丙午丁未（1546—1547）之間，县之风俗又一变矣。〔3〕

上面所描繪的現象，頗能反映出破曉前的社会动盪局面。和这新变化一起存在而尚須加以注意的，則在这个时期前后，明代社会經濟还出现了其他新变化，其中最明显的，約有二点：一是白銀使用与賦役的改革；一是国内商品流通的頻繁。因为对这些問題的說明，可以使我們进一步的明白明代江南及沿海地区經濟的成長，不是孤立的，而为当时中国社会經濟发展的一个总傾向。茲分述如下。

（一）白銀使用与賦役的改革

中国使用金銀的記載，是很早就有的。但是把白銀作为一种通貨的手段，广泛的使用，那是在明代才开始的。元末农

民大起义后所建立起来的朱明王朝,对于恢复生产,相应地減輕农民的束縛是起了一定的作用,諸如严惩貪污,迁徙富戶,以限制地主的活動;并把全国戶口,分为民戶、軍戶、匠戶三等,使成为自由民戶。此外,明太祖又特別注意于农业的增产。明史食貨志載:

太祖初立国,即下令,凡民田五亩至十亩者,栽桑麻木棉各半亩,十亩以上倍之。[4]

这些措施使明初的社会生产力获得发展,从而促进了商品貨幣经济的成長,所以尽管明代初年为着稳定宝鈔的发行,洪武八年(1375)禁止金銀交易。

每鈔一貫,准錢千文,銀一兩,四貫准黃金一兩,禁民間不得用金銀物貨交易,違者罪之,以金銀易鈔者听。[5]可是这并不能阻止客觀的社会經濟发展,而“民間交易惟用金銀”,那是无法禁止的,所以到了英宗正統时期(1436—1449)禁止使用金銀的法令,无形中已被摒弃。

初岁賦不征金銀,惟坑冶稅有金銀入內承運庫。其岁賦偶折金銀者,俱送南京供武臣祿,而各边有緩急,亦取足其中。正統元年改折漕粮,岁以百万为額,尽解內承運庫,不复送南京,自給武官祿十余万兩外,皆为御用,所謂金花銀也。[6]

这种以南畿等省漕粮折納金花銀,不仅确定了白銀使用的法律地位,复因“弛用銀之禁,朝野率皆用銀”[7],自更有力地推动由于土地集中所产生的負担不均与賦役的混乱,进行改革。固然,明初早有折色的名目,而把白銀折納差徭,称为銀差;又把力差变为銀差,在全国各地普遍的推行起来,則当为正統以后之事。再跟随着白銀流通的广泛,逐漸侵蝕自然經濟的体系,于是正統以后賦役的改革,大半以改正征收方法,使用白

銀交納为主，正統時夏時在江西所創始的鼠尾冊，嘉靖時的綱銀、一串鈴、十段錦諸法，都和用銀繳納有關的。最後，則有一條鞭法的實施。

一條鞭法者，總括一州縣之賦役，量地計丁，丁糧畢輸于官，一歲之役，官為僉募，力差則計其工食之費，量為增減。銀差則計其交納之費，加以增耗。凡額辦派辦京庫歲需與存留供億諸費，以及土貢方物，悉并為一條，皆計亩征銀，折辦于官，故謂之一條鞭，立法頗為簡便，嘉靖間數行數止，萬曆九年乃盡行之。〔8〕

實施一條鞭法，固然尚不足以解決農民負擔過重的問題，並且在推行時也還有一些人持反對的意見，不過無論如何，這一個改革是在商品貨幣經濟有一定程度的發達之後才實現的，因其採取攤丁入地的辦法，所以對於工商業人口，在相對上言之，仍是有利的。

夫條編非盡便也，相提而論，便多於不便也。世所稱不便者，大概謂賈販的脫免，是為利末而病農。門丁不加征，是為幸富而禍貧。夫丁銀所出幾何，土人列肆，可屈指數也。臨清多大賈，業征房號錢，且其人皆僑居，不領于有同之版籍，獨云田無等差，斥鹵平沙，與平臯腴壤，按亩科征，誠非鳴鳩之平耳。〔9〕

按上記，臨清富商雖仍有負擔商稅、房號錢等，但一般工伎、手作、營顧貿易、種藝、佣力之人，却是可以免除徭役負擔的，這就為工商業的發展創造了必要的條件。再就地區言之，當時人都一致認為一條鞭對於江南地區，是有好處的。

嘉靖末年創立條鞭，不分人戶貧富，一例攤派；不論倉口輕重，一併伙收。其將人力二差，與戶口鈔鹽并之于地，而下力反不與專，商賈享逐末之利，農民喪樂生之意。

然其法在江南犹有称其便者，而最不利于江北。〔10〕

从这里看来，一条鞭法的改革，对于明中叶以后，江南市民经济的成长，不是没有作用的。

其次，白银的使用又曾引起明代税制的一系列的改革，成弘（1465—1505）之间，盐法亦起改革。

明初各边开中，商人招民垦种，筑台堡，以自相保聚，边方菽粟无甚贵之时。成化间始有折纳银者，然未尝著为令也。弘治五年，商人困守支，户部尚书叶淇请召商纳银运司，类解太仓，分给各边，每引输银三四钱有差，视国初中米直加倍，而商无守支之苦，一时太仓银累至百余万，然赴边开中之法废，商屯撤业，菽麦翔贵，边储日虚矣。〔11〕就是商税亦渐有用银者。

成化七年增置蕪湖、荊州、杭州三处工部官，初抽分竹木止取钞，其后易以银，至是渐益至数万两。〔12〕在全国普遍用银的影响下，又有班匠银的出现。

凡班匠征银。成化二十一年奏准，轮班工匠，有愿出银价者，每名每月南匠出银九钱，免赴京。所司类责勘合，赴部批工。北匠出银六钱，到部随即批放，不愿者仍旧当差。〔13〕

由于白银在国家财政上逐渐居于重要的地位，这样就给货币经济以新的发展机会。于是白银并成为民间计算物价、工价的尺度。这样的例子是随处都可以遇见的，下面仍根据明史食货志所载的，引用如次：

成化十六年又令三梭布折米，每匹抵三十石，其后粗闊棉布亦抵三十石。梭布极细者，犹直银二两，粗布仅直三四钱而已，久之定布一匹，折银三钱。〔14〕

邵经邦的读史笔记亦称：

宏簡錄刻費九百余金，計字三百四十万有奇，每百字
为銀二分七厘，为錢二十文（原注：今刻字中价每字約一
文半）。[15]

白銀的大量使用，影响到整个税制的改革，然其中有一点最值得注意的，則是这时徭役賦課的对象，漸从人丁向着田土的轉換，就大大的解除了身分制的束縛，把徭役改为雇役，在人与人間产生了赤裸裸的貨幣关系，因而使得生产者与生产資料的最初分裂露出原始的端緒，而为国内的統一市場創造可能出現的条件。

白銀使用的另一个后果，則是促进商品交換的頻繁，金融事业的发达，引起白銀財富的集中。据記載，明代正德以后的大官僚、大宦官均集中有巨額的白銀，如刘瑾藏有銀元宝五百万錠，約銀二十五千万兩，零銀一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兩。錢宁藏有銀二千四百九十扛，共四百九十八万兩。江彬銀二千二百櫃，共四百四十万兩。严嵩在江西的家产，即折銀二百三十五万九千二百四十七兩七錢七分九厘二毫[16]。固然，集中在这般大官僚大宦官手里的巨額白銀，不是窖藏，就是浪費，对于当时的社会生产沒有起任何的作用，但“江南富室有积銀至数十万兩者”[17]，是常見的事。这班富室有不少是从經營工商业起家，而累积有巨額財富的，如果再具备有其他的社会条件，那是完全可以發揮作用的。

（二）国内商品流通的頻繁

明代初年的积极恢复生产政策，对于扩大生产所起的作用，前面已經大略說过。特别是自明中叶以后，中国各地新的生产关系的萌芽，更加助長商品經濟的发展，国内物資的頻繁流轉。而促成这些現象的出現，則和商品化作物种植的專門

化与地域的分工，有一定的关联。关于明代商品化作物种植的情况，大体言之，江浙是蚕桑区，湖州有种桑至数十万株者[18]。而棉花则跟着中国纺织手工业的发达，而逐渐普遍种植起来。

中国所傳木棉，亦有多种，江花出楚中，……北花出畿輔山东，……浙花出餘姚，中紡織，棉稍重，二十而得七。吳下种大都类是。[19]

按上所記，則明代棉花的种植，除江浙兩省之外，河北、陝西、河南、山东、湖南諸省皆有，茲分別引之如下：

朝邑无他奇产，載其美者多者。……服則木棉絲，絲出南阳洪者，断則易績，引之則長。[20]

南阳李义卿，文达公賢之曾大父也。家有广地千亩，岁植棉花，收后載往湖湘間貨之。[21]

林县居太行下，……惟南川平衍，宜桑棗黍穀麻菽木棉，喜潦惡旱，山产則甲于諸县。……武安、涉皆并山作邑，……东南北則沃衍，……与涉田絕宜木棉，涉則产鉄及自然銅。[22]

东昌府，棉花六府皆有，东昌尤多，商人貿于四方，其利甚博。[23]

鄆城，土宜木棉，賈人轉鬻江南，为市肆居焉。五穀之利，不及其半矣。[24]

(湖南)各郡之为农者，种黍种麦种什豆棉花，或二熟或三熟，此詘則彼贏，長沙之田止堪一种，遇水旱則千里无粒米之入矣。[25]

和木棉种植同时发达起来的，則有染料作物，明代福建之藍，号称甲天下。

靛出山谷中，种馬藍草为之，……利布四方，謂之福

建青。[26]

又天工开物亦載：“閩人种山皆茶藍，其數倍于諸藍。”[27]其他如江苏、浙江、江西諸省，几无不种之者。

(松江)孔涇……地產蘿菔、薯蕷、黃麻、藍靛之類。[28]

藍草，可染青，山陰人种之为業。[29]

江西万羊山跨連湖廣、福建、廣東之地，旧称盜藪，而各省商民亦常流聚其間，皆以种藍为業。[30]

(贛县)城南人种藍作靛，西北大賈岁一至，泛舟而下，州人頗食其利。[31]

这种染料作物的种类是繁多的，福建邵武曾產有姜黃，亦为染料之一，远銷各地。

姜黃，本地邵武县一都出，客商多販往汴梁、南京，以供染及和諸香作綫香。[32]

此外，蔗田則以閩、粵、川諸省为盛。天工开物云：

凡甘蔗有二种，产繁閩廣間，他方合并，得其十一而已。……今蜀中种盛。[33]

福建甚至出現有蔗田与稻田爭地的現象。

甘蔗干小而長。居民磨以煮糖，泛海售商。其地为稻利薄，蔗利厚，往往有改稻田种蔗者，故稻米益乏，皆仰給于浙、直海販。[34]

烟草亦于此时初种于福建，当天启崇禎間且傳至江南，如云：

烟叶其初亦出閩中，予幼聞諸先大父云：福建有烟，吸之可以醉，号曰干酒。……崇禎之际，邑城(上海)有彭姓者，……种之于本地，采其叶阴干之，遂有工其事者，細切为絲，为远客販去。[35]

甚至“北土亦多种之，一亩之收，可以敌田十亩，乃至无人不用”。[36]

由于当时榨油业的发达，江、浙两省农民多有种植烏柏为业者。

烏柏之实可作油，今嵊县新昌山中，人家植之为业。[37]

元扈先生曰：烏臼树收子取利，甚为民利。……江、浙人种者极多，……临安郡中，每田十数亩，田亩必种白数株，其田主岁收白子，便可完粮，如是者租額亦輕，佃戶乐于承种，謂之熟田。若无此树，要当于田收完粮，租額必重，謂之生田。兩省之人既食其利，凡高山大道、溪边宅畔，无不种之，亦有全用熟田种者。[38]

至于果树、蔬屬、席草等的种植，則南北各地都很普遍。如河北魏县、長垣的种植梨棗。

（魏县）其終岁勤动，大抵力树艺，务蚕繅，絲成則坐賣山右之商，梨熟則远趋江南之利。[39]

（長垣）又一二梨棗間远鬻江淮。[40]

又如浙江的广种席草。

莞草有二种，一为席草，一为灯心草，山阴威鳳乡及戴旗山种之，故有莞田。[41]

蒲水草可作扇，蕭山鳳仪乡民以之为业。[42]

这些商品化作物的大量种植，不仅影响了农民經濟，也改变了农民的經營形式。明代中叶以后，在商品經濟的刺激下，中国各地的农业經濟已采取多种經營的方式，而不是單一性的农业。这里，我要附帶論述中国封建社会里这多种經營經濟的产生，固然，有些原因是为着滿足封建地主的强度剝削而逐漸兴起的，在一定程度內会加强农业与手工业的結合。然而

在商品貨幣經濟的高度發達的明代社會里，這多種經營經濟更有助於商品的流通，而給商品的國內市場創造了可能出現的條件。

下面擬引用崇禎時何喬遠的閩書風俗志所記福建各縣的農產情形，作為示例。

福州，閩中一都會也，……頗饒魚鹽果實紡織之利。……長樂濱海有魚鹽之利，山出果實販四方，有荔枝、龍目、青李之品。……泉州枕山而負海，田再易，園有荔枝、龍眼之利，焙而干之行天下。……附山之民垦辟磽确，植蔗煮糖，黑白之糖行天下。……南安去晉江可十里，土壤肥沃，宜瓜蔬之屬，荔枝之實，視晉江差勝。……惠安地少壤多，宜稻三之，宜麥一之，登麥之後，是種番薯，可以支歲。緝繡織苧，有葛屨蟋蟀之風焉。……輞川……家豢鷄鵝羊豕，可以饗他郡。……德化萬山中，……民勤稼穡，種麻苧，婦女專辟績。園蔬池魚山果取自給，弗鬻于市，……有杉木之饒，陶型之器。……同安是生吉貝之鄉，而女善為布。……永春……是生樂山之茶，穀惟稻稔，木綿荔枝弗產也。土沃泉膏，率種一斗，而收十之六七，余可食郡中，有山林陂池苑囿之利，杉木之饒，白苧之布，比弱吳紈。……建陽……茶歲三收，苧歲四收白，雪之梨，豆腐之蕘。……浦城……其地寡田，其民勤耕織，桑麻被亩，茶笋連山，民以畜力富。……延平附郭為南平，……田俱宜稻，其山宜茶。……將樂其民多技而專勝，鄉有苧布之利，喜于為商。……大田……有種苧紡麻之利，多養羊，其革以為履。……尤溪……是生黃蜂之蜜，菇笋之脯。……建寧土地膏腴，專有魚杉油漆苧麻之利，以通商賈。……長泰之山，并有佳葛。〔43〕

这一节記事是充分的告訴我們，明代的福建某些地区的农业經濟，是采取多种多样的經營形式；农民的生活来源，頗大部份系依靠着商品化作物的种植，这虽限于福建一省而言，然而中国农业經濟之采取多种多样的經營形式，并不限于福建一省，内地各省是到处皆然的。茲举万历秀水县志的一段記載如下：

城西北为云柿、伏礼、永乐諸乡，俗儉嗇，土腴可植果实，农隙业草履，或客魚鹽。[44]

在这个历史条件之下，非但远距离的販卖成为必要的事，同时，也促进了各地方手工业的发达。其表現在棉紡織工业方面，則除松江之外，其他地区的棉紡織业也都发展起来了。福建沿海，即出現有不少的棉布产区。

莆作业布为大，有綿布，織吉貝为之。……下里人家女归，治此甚勤，每四五日織成一布，丈夫持至仙游，易谷一石。[45]

同安……是生吉貝之綿，而女善为。[46]

北則河北的肅宁。

数年来肅宁一邑所出布匹，是当吾松十分之一矣。初犹莽莽，今之細密，几与吾松之中品埒矣。其价值，仅当十之六七。[47]

山东的汶上。

瀕汶一帶，擅水土之饒，……西則地宜木棉，紡車之声相聞，远者距城二里許。[48]

湖北的蕲水。

邑人入夏以来，于地之亢爽者，多植棉花，七月十五日以后，从而拾之，紡而織之，机杼之声，戶相聞焉。[49]

北方棉布的产量逐漸增長，几足以与南方相抗衡，所謂“今北

方自出花布，而南方織作几弃于地矣”[50]，即是报道这个消息。

在紡織业的影响下，“蕪湖万貨之会”[51]，又成为当时漿染业的中心。天工开物就这样說：“凡棉布寸土皆有，而織造向松江，漿染向蕪湖”[52]。在漿染业中并发现有龐大的商业資本投資于手工业經營。这个问题，汪道昆的太函集即載嘉万时代蕪湖的一个徽商投資漿染业，專門从事染色的活动。

長公(阮弼)則云蕪湖，盖襟帶一都会也，舟車輻輳，是可以得万貨之情，雅以然諸重。諸賈人不言而信其言可市。諸賈人奉之如季河东。彼中黽僮分行，独赫蹏莫之适主。長公曰：此吾业也。請取赫蹏，乃鳩其曹斂母錢，躬載橐而規便利。就諸梱載者悉居之留都，轉運而分給其曹，利且数倍。时購者爭得采，利归染人。長公复筴曰：非独染人能白可采也，乃自蕪湖立局，召染人曹治之，无庸灌輸，費省而利滋倍。五方購者益集，其所轉穀，徧于吳越荆梁燕豫齐鲁之間，則又分局而賈要津。長公为祭酒，升降贏縮，莫不受成[53]。

以上所举只是一些例子而已，再据天工开物所載，則明代的开矿、制鉄、冶鑄、車船制造、制紙、制糖、榨油、制鹽、印刷、朱墨、武器制造业等均在全国各地普遍发展起来。这还是規模較大的手工业，至其他零星的日用品工业，亦复不少。略如江浙兩省的織席业，也有一定的产量。

甬东多种席草，民以織席为业著四方，曰明席。[54]

(烏程)蘆，溪岸多有，土人采之織为席。[55]

仙居之貨有鉄厝席。[56]

席出各乡村，吳中草席，自昔著名天下。澣墅乡村妇女織席者十之八九，……席草之市，席机之匠，惟澣墅有

之。[57]

金墅(長洲)濱湖饒魚米,人以織席為業。[58]

新安、開化(無錫)之間,居民田事稍閑,即以織席為業,成則負鬻于游墅虎丘之肆中,少自賣者。[59]

這些大小的手工業品,固然,它的生產,有的已經採取手工工場的生產形態,有的還沒有脫離農副業的形式,但是有一點可以指出的,即他們絕大部分是作為商品而提供到市場上面來,並通過商人之手而外運的。只福建一省,據閩部疏的記載,即有不少物資運出該省,並在國內外市場上販賣。

凡福之綢絲,漳之紗絹,泉之藍,福延之鐵,福漳之橘,福興之荔枝,泉漳之糖,順昌之紙,無日不走分水嶺及浦城小關,下吳越如流水。其航大海而去者,尤不可計。皆衣被天下。所仰給他省,獨湖絲耳。紅不逮京口,閩人貨湖絲者,往往染翠紅而歸織之。閩山所產,松杉而外,有竹、茶、烏柏之饒,竹可紙,茶可油,烏柏可燭也,福州而南,藍甲天下。[60]

這是很概括的把福建商品流通情況描述出來,其實,明代中葉以後,福建商品的“行天下”者,那是很多的。天啟邵武府志即載,苧布、葛布、紙“俱出邵武縣,四方商賈,多結販往湖廣、南直隸諸處變賣,本郡諸貨,惟以此頗得利”[61]。何喬遠的閩書,也有同樣的記載:

建陽書坊之書盛天下,其絨毯氈囊,不名毳毼,其竹可以紙,其泉沆瀣可以釀,其釀行東南。……崇安建岩邑也,……炙肉以為脯,煮藤以為被,走鳥以為銀,走鳥之銀,盤卮簪環之屬行天下。……順昌介東廣之冲,溪山秀麗,煮竹為紙,紙曰界首、曰牌,行天下。其酒行八郡。……莆壤地褊小,……其扇行八郡。[62]